

德川幕府对外关系史料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赵 刚

内容提要:《遣大明国》、《遣福建道陈子贞》及《答大明福建都督》是江户初期最能反映幕府的对明朝外交政策的基本文件。日本在庆长十四年,与朝鲜缔结了《己酉条约》(庆长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然而,幕府政权与明朝的外交关系,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因为明朝政权在江户幕府创立不久就被清朝取代(1644年)。同时,最为重要的则是江户幕府通过两次大阪城之战的胜利,稳固了政权的基础。日本的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以上述史料为依据,对江户初期幕府对外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探讨。

关键词: 德川幕府 外交政策 对明关系 史料

庆长五年(1600),取得了“关原之战”的胜利并确立了在诸侯中霸权地位的德川家康,对内通过将丰臣时代的大名进行改易、转封、扩大天领地、任命新谱代大名等措施确立了江户幕藩政权,对外则在庆长六年制定了“朱印船”制度,积极地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随之,德川幕府在庆长九年制定了“割符”制度。在中止勘合贸易后,幕藩政权又从葡萄牙商人手里夺回了对明贸易的垄断权。在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幕府的真实企图,即是意在修复对明关系。

一 江户初期德川幕府的外交途径

关于当时幕府外交政策的特征,藤野保教授指出:“企图恢复对明贸易的德川家康,在取得对朝鲜外交的成功与之恢复了外交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加强了对琉球的外交攻势。在此我们可以显见德川家康有利

用朝鲜和琉球作为中介恢复日明关系的意图。”^① 另外，就幕府对明议和交涉的途径，纸屋敦之教授指出：“当时幕府对明议和交涉有经由朝鲜和福建两条途径，特别是经由福建的途径是以琉球为中介的。”^② 关于庆长十四年（1609）由岛津家久发动的出兵琉球王国事件的原因，该教授则进一步补充说明道：“从表面看，这一事件似乎是因为琉球王国无视德川家康的来聘要求，然而真正的理由却是因为幕府在对明交涉经由福建途中，作为明朝朝贡国的琉球王国的存在，对于幕府来说是不可忽略的。”^③

以上论述都指出了在幕府初期的对外交涉中存在着“特定的媒体”。但是，这种“特定的媒体”，严格地说只是限定于幕府与明朝进行直接或间接交涉之时。而西班牙及菲律宾等国虽然也通过加藤清正、寺泽广高、伊达政宗等幕臣与幕府进行交涉，但是不存在“特定的媒体”。这些国家的元首可以直接给幕府将军发送文书。在这一系列交流中，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都没有通过这种“特定的媒体”，而是直接给他们回复了文书。为什么幕府在与明朝的交涉中与其他国家有这样大的差别呢？其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对外。如果幕府能通过与明朝进行直接交涉建立起正式的贸易关系，幕府即可打破葡萄牙商人垄断对明间接贸易局面而获得巨大利益。其二是对内。幕府如果能得到当时东亚唯一大国明朝的承认，就能证明以江户为根据地的幕府政权具有正当的统治地位。而且这两者之间的重心明显在于后者。

江户初期执笔幕府外交文书的人物主要有天海、崇传、林罗山等。其中崇传尤其受将军德川秀忠的信赖。在德川秀忠执政期间，幕府的外交文书基本上都是由他来起草的。然而，从江户幕府诞生的庆长八年（1603）到明朝灭亡的正保元年（1644）的41年间，幕府发往明朝的三封外交文书却都是儒学者林罗山所书。对江户初期幕府对外交涉史研究时这些文书却往往容易被忽略。比如藤野保教授在涉及江户初期唐船贸易问题时指出：“试图与周围各国促进亲善外交的德川家康，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同明朝恢复邦交并向明朝请求恢复两国间的贸易，但是交涉最

① 藤野保『近世国家の成立・展开と近代』、雄山阁、1998年。

② 纸屋敦之「琉球・阿伊努と近世国家」、『岩波讲座・日本通史』、岩波书店、1993年。

③ 纸屋敦之『幕藩制国家の琉球支配』、校仓书房、1990年。

后以失败告终。然而，唐船却从长崎和萨摩等九州各地来航，而且其数量也不断增加。这是因为明朝放宽了海禁政策或对日本渡航船采取了默认政策。”^① 藤野保教授在其著作中指出：德川家康虽然打出了亲善外交的大旗试图与明朝恢复邦交关系，但最终却未取得成功；明朝对幕府的交涉虽然没有回应，但自宽永年间以后去往日本的明船数量却明显增加。其理由究竟是什么？藤野保教授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测，而对当时最重要的史料《遣大明国》、《遣福建道陈子贞》和《答大明福建都督》都一概没有言及。

二 围绕《遣大明国》、《遣福建道陈子贞》及 《答大明福建都督》的几个问题

（一）《遣大明国》和《遣福建道陈子贞》形式

《遣大明国》及《遣福建道陈子贞》的落款同为庆长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这是德川幕府在同日向同一国发出的两封信函。

《遣大明国》的形式近似于国书，这是因为它不是由正式的信使带往明朝的。文书是用本多正纯的名义发给明朝福建总督的。抬头所书“福建总督军务都察院都御史”中，“福建总督军务”为地方官僚的职位，而“都察院都御史”则为中央官僚之名称。根据《明史·职官志》所载：“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② 总督的正式称呼一般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 ○○都御史总督 ○○地方军务。即，皇帝给予去地方赴任的行政长官以中央官僚的头衔。同时，《明会典》又有下述条文：“国初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抚各处地方，事毕复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抚，或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又文移往来，亦多窒害，定为都御史巡抚。兼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管粮饷者加总督，兼理、巡抚”^③。总督

① 藤野保『近世国家の成立・展开と近代』、雄山阁、1998年。

② 《明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③ 《明会典》，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

之职在明朝初期并非常设之职，其作为中央官僚的临时工作，根据需要而加以设置。明代后期，其在一部分地区被作为常设机构固定了下来。

本文所提及的以本多正纯的名义发给明朝福建总督的信件的收件人福建总督，根据《明督抚年表》的记载：“永乐间，遣侍郎视福建，以后或镇守，或督军，以事间遣。至嘉靖三十六年，始命都御史巡抚浙江，兼管福兴、建宁、漳泉等处。三十五年，以闽、浙道远，专设提督军务兼巡视福兴、漳泉、福宁海道都御史，仍听总督节制。后改巡抚福建地方，统辖全省。四十年总督亦罢，其南赣军门所辖汀州一府，浙江仍两属。又兵部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建地方一员。”^① 福建总督的职位在嘉靖四十年（1561）已被废止。也就是说庆长十五年（1610）虽然幕府给明朝发送了《遣大明国》一文，然而明朝方面并没有“福建总督军务都察院都御史”其职和其人。同样关于福建道陈子贞，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三十九年（1611），他也未以“右都御史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的身份在福建任职。

（二）关于传书人周性如的疑问

《遣大明国》及《遣福建道陈子贞》中都提到了周性如。幕府委托他将这两封信交给明朝，但是此人身份不明。在《遣大明国》一书中称其为“应天府周性如”，而在《遣福建道陈子贞》中却称其为“吏目周性如”。而在《异国日记》的注释中，崇传将周性如又写为“福建道商士周性如”及“唐人周性如”。“应天府”即为今日的南京市。也就是说，周性如应该是从南京而来或是出身于南京。而“吏目”是指官位低下的文官，也即周性如有可能是明朝的低级官吏。而“福建道商士”则表明周性如来自福建或出身于福建。周性如的身份究竟如何？根据现阶段的资料很难进行判断。不过，德川家康曾经亲自在骏府城与他会见，还给予其朱印状，上面写着“应天府之周性如商船来日本时，虽为到达任何之浦浦津津，加守护速可达长崎，诸人宜承知，若背此旨及不义者，可处罪科者也。”^② 迄今为止，幕府虽经常给予外国船只朱印状，但是直接授予个人朱印状的事例极少。由此可见，幕府曾对其极具期待。

① 吴廷燮：《明督抚年表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华书局，1980年。

② 『异国日记』。

(三) 关于《遣大明国》和《遣福建道陈子贞》的内容

从《遣大明国》抬头所书“奉旨呈书”，以及落款用了德川家康的御印这两点来看。这封书信名意上虽是本多正纯代替德川家康给明朝福建总督军务都察院都御史所写，但这封受德川家康指示而写的书信的真正目的，显然是想直接向明朝皇帝表明幕府求和及重开勘合贸易的意向。

文中提到了明日两国反目的原因“大明使者事件”。庆长元年（1596）杨方亨、沈惟敬为了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明神宗皇帝派册封使赴日，但因丰臣秀吉不满于诰命的内容而被撵返。许多日本学者都认为丰臣秀吉因此事恼怒而加强了对朝鲜的攻势。然而，大庭修教授对照以往明制诰命的实例进行了周密的考察后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这纸诰命明确可言的是它属于明廷封属藩王时之所用。同时，诰命的文字虽为仪式之状，而其内容实质是为敕谕。”^①从而否定了诰命中存有失礼的言辞。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出自主张与日本言和的沈惟敬等官僚的手笔，故而诰命并无挑衅言辞。并且，就当时的诰命历经 400 多年后现在仍作为日本的国宝完整地保存于大阪市立博物馆内而言，大庭教授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遣大明国》也未提及诰命的具体内容，仅停留于说明因翻译的失误而引起了双方的误解。该文书主要阐述了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国内政治安定，民众生活丰足有余。同时也强调了日本的德化已经遍及朝鲜、琉球、东南亚各处。

书中请求明朝皇帝给予“勘合之符”，并称如果明朝皇帝给予其“勘合之符”，明年秋季日本一定派遣一艘“大使船”前往明朝。限定船数，无非是想让明朝皇帝感到安心而已。为何这样认为呢？此事可回溯到文禄二年（1593）丰臣秀吉在明日交涉之际提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两国年来依间隙，勘合近年断绝矣。此时改之，官船、商船可有往来事。”那时对官船、商船的数量未加限定。

文禄二年（1593）丰臣秀吉在明日交涉之际，也有重开勘合贸易的请求。但是明神宗的册封使前往日本时并未同意。推断其理由不外乎

^① 大庭脩『豊臣秀吉を日本国王に封ずるの明の诰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四辑、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1 年。

有二。

其一，勘合贸易并不符合明朝的自身利益。如《明史》所载：“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可见自明代初期起即有为数众多的国家与明朝进行了贸易，而明朝政府并未从其那里收取过税金。

其二，如《明史》所载，“复三年，是月，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明朝从建立初期即为倭寇所扰。对倭寇进行禁压，即为明朝与室町幕府进行勘合贸易的前提条件之一。然而，丰臣秀吉在文禄二年（1593）明日交涉之际提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里没有言及这一部分。

与此相比，在《遣大明国》中诸如“若余船之无我印书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贼奸宄伏鼠岛屿而猾中华之地境之类，必须有刑法”等叙述，表明幕府主动提出愿意对海盗进行取缔。而文书的最后所言“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则表现出幕府政权一改丰臣秀吉时日本所执行的强行对抗路线，而欲以灵活低调的姿态与明朝进行外交交涉的愿望。

《遣福建道陈子贞》是隶属于《遣大明国》的行文。文书的内容有三点：（1）请求发予勘合符；（2）要求访明；（3）提请以长崎为贸易港口，对来自福建等地的明朝商船开放。第一及第三条的内容与《遣大明国》基本相同。值得引起关注的是第二条中长谷川左兵卫藤广要求访明之事。

幕府的官僚要求访明并不仅限于这一次。《外蕃通书》的补注中有以下文字记载：“龙伯法印《与琉球书》中云：我将军谴岛津家久与贵国相谈而年来商舶于贵国，而大明与日本，商买通货财之有无云。又琉球王尚宁《送福建军门书》亦举三条曰：大树日本将军之意，而州君所以欲通两国之志者也。”可见，当时的幕府政权也曾通过琉球王尚宁与福建巡抚陈子贞联络要求面会。

但是，从结果来看，不仅明朝皇帝未见过这两封文书，就连时任福建巡抚的陈子贞也未看到过。其原因则可从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

说起。

（四）明朝的海禁政策及海上秘密贸易

明朝从太祖洪武帝时就开始实行海禁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对于那些习惯于海上生活及依赖海外贸易为生的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居民来说，从一开始就显得毫无意义。因此，尽管海禁政策在明朝被反复强行实施，但是违反这一政策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人却屡见不鲜。然而这一政策在隆庆元年（1567）后有了很大改变。佐久间重男教授指出：“隆庆元年，根据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已经实行了近两个世纪海禁政策，即‘下海通蕃’的禁令终于被解除了。东西洋的通商交易被允许，海澄县月港变成开洋的据点成为中国商人去海外出航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这件事说明，这一地区从以前的进行秘密贸易的出航基地而成为了被官府承认的通商贸易港口。”^①

但是明朝对于日本的海禁政策，却从未正式解除过。为了应对丰臣的侵朝，身为宗主国的明朝在向朝鲜派遣援军的同时，还强化了福建沿海的海禁政策。在这样的状况下，民间商船无法公开与日本进行贸易。即便如此，仍有不少船只为了寻求利益而前往日本，传书人周性如的商船恐怕也是其中的一艘。《异国日记》里除记载周性如赴日一事之外，还有庆长十五年（1610）广东船前往长崎港时，德川家康给予他们朱印状并明令地方官员加以保护的记录。然而他们毕竟是私自前往日本的。而依照《大明律》“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外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蕃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②的条文，没有政府的许可而擅自与海外进行贸易者，其罪名与谋反相当，不光是本人连全家都要被问罪的。

（五）《答大明福建都督》的形式及内容

《答大明福建都督》是当时任长崎代官的末次政直回复明朝“钦差总督都察院都御史福建巡抚”的文书。落款为宽永二年（1625），即明

① 佐久间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

②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

朝的天启五年。离幕府委托周性如将《遣大明国》及《遣福建道陈子贞》转交于明朝官府已经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这封文书中也有体现。如文书开头所书“奉复状”一词，说明这封文书是得到了幕府指示后而写的。

《答大明福建都督》的内容主要有三：（1）对福建巡抚愿意重开贸易的姿态表示致谢；（2）申明现行猖獗的倭寇并非出自于日本国内；（3）希望与明朝展开交流。宽永二年（1625）时任福建巡抚之职者当为朱钦相。据《明史·本传》所书：“钦相擢太仆寺少卿，五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讨贼杨六等有功，以忤忠贤除名。”朱钦相天启六年五月至第二年天启六年的七月担任福建巡抚之职。当时《答大明福建都督》并非寄给朱钦相，而是寄给朱钦相的前任南居益的。南居益写信给幕府，要求幕府政权加强对盗贼的取缔。为此，时任长崎代官的末次政直代表幕府给南居益写了这封回信。文书主要强调了当时在幕府统制下政治稳定及百姓生活富足的情况。而针对南居益希望逐渐恢复两国关系的好意，末次政直虽然也表示了感谢，但跟庆长十五年那封文书相比，在恢复两国关系这一点上，并未显示出幕府的积极态度。而在对外交涉方面，从这封文书中我们可以觉察到幕府政权比以前老练了许多，日明关系则从那时开始由紧张而趋于缓和。我们可以推断，在庆长十五年（1610）至宽永二年（1625）间，日本与明朝的交流并未处于完全断绝状态。除了民间存在走私贸易的事实外，政府之间诸如幕府与福建地方官僚那样的交涉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六）围绕元和七年来自浙直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的文书的几个问题

元和七年（1621）六月，明朝政府浙直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的一名王姓佥事给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发送了一封文书。文书的内容在《异国日记》及《外蕃通书》均可见。佥事之职始于宋代，主要是掌管文案，充当高级幕僚。直至明代，都督、都指挥、按察、宣慰使等官府均置此职。负责浙江、福建等沿海防卫任务的浙直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收到福建军门海道倭寇活动日益猖獗的报告后，给幕府政权发出了这封文书，要求幕府取缔其管区内的盗贼。文书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两国关系有所缓和。《异国日记》里有云：“于是海禁从宽，

来往商船得以通航。”万历四十七年（1619）前后，明朝的地方政府默认了与日本的贸易活动。其起因正如同文书中所提及的那样，是因为幕府于元和三年将明军俘虏董伯起等人遣返回明朝。

其二，明朝政府表示愿意在设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同意与幕府重开贸易的。“将军麾下，投递乞行令各郡，将所到商船逐一查理，及一切经年流落商人，或赌博棍徒，皆易为盗者，悉宜细勘，俾人脏得实，即严刑惩治。庶上伸三尺之王章，而商利允活。下杜两邦之盗患，而边疆永靖。”

明朝政府一直要求日本取缔其国内的盗贼。庆长十五年（1610），幕府政权向明朝政府发出《遣大明国》与《遣福建道陈子贞》两文书，请求与明朝重开贸易。文书中写道：“寇贼奸宄伏鼠岛屿而猾中华之地境之类，必须有刑法”，主动向明政府提出将对盗贼进行严厉处罚。然而，这次幕府却拒绝接受这封文书，并将使者赶回。《异国日记》里记载着当时幕府回复明都督府使者单凤翔的公文的内容：“大明日本之通信，近代自朝鲜告对马，对马奏上之，今猥无由执奏之，忽还邦而以朝鲜译通可述所求之事也。”从表面看，幕府拒绝接受该文书的理由是文书未经由朝鲜、对马而直接抵达了日本，但是关于真正的原因《德川实纪》有以下的记载：“是月，明钦差总督镇浙直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僉事王有文书至。谓有以两国商船交易为名行奸贼之业。聚众劫掠货物，以至杀伤官兵。切望细加勘察而严刑惩治。其文体尤为无礼。不得不拒之。”^①幕府拒绝接受文书的理由，是认为其文体不合乎礼仪。此时此刻幕府政权为何要在文书的文体形式上进行挑剔而失去了与明朝修复关系的机会呢？后文中将再次涉及，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幕府的环境及其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与庆长年间已有很大不同。

（七）《答大明福建都督》以后的两国贸易

宽永元年（1624）福建巡抚南居益给幕府政权发送了要求强化对盗贼取缔的文书后，使曾经颇为紧张的两国关系缓和了许多，也为重开贸易打下了基础。然而南居益在天启五年（1625）离开了福建巡抚之职。而且这一年后金政权将首都迁至沈阳，同时加紧了对明朝的军事行动，明朝政权将主要的视线由东南沿海转移到北方的后金政权。与和日本恢

① 黑板胜美编「德川实纪」第二编、『国史大系 39』、吉川弘文馆、1964 年。

复邦交一事相比，解决来自后金政权的威胁对于明政权来说更显得紧迫，因此明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直到最终也未能恢复。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两国的民间贸易在两国政府的默许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根据永积洋子教授的统计，宽永十八年来自明朝的商船达到了 28 艘。^①《通航一览》^②也有诸如“宽永十四年丁丑年，始唐商旅泊差宿之事同十八辛巳年，又定宿于町内”那样的记录。可见到宽永十四年时，由明朝前往日本的贸易船只的数量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

三 从《遣大明国》、《遣福建道陈子贞》及《答大明福建都督》所见幕府政权在江户初期的外交策略

（一）近世初期幕府政权的外交文书

近世初期活跃于幕府政权外交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有本多正纯、本多正信、后藤庄三郎、长谷川藤广、寺泽广高等。作为德川家康的亲信本多正纯共在 12 封外交文书上署名。在外交这一领域本多正纯的重要性显得非常突出。而代替本多正纯起草《遣大明国》、代替长谷川藤广起草《遣福建道陈子贞》的都是林罗山。其中，特别是起草《遣大明国》一事，在日本近世外交史上更具特殊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由儒学者起草幕府的外交文书。从此，在幕府政权的外交舞台上儒学者逐渐代替禅僧而崭露头角，林罗山则毫无疑问是其代表人物。

（二）海上贸易和关原之战后的幕府外交

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其统治地位尚未得到巩固。幕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积极与各国进行外交交涉，并设立了“朱印船制度”和“系割符制度”。一方面是想打破葡萄牙人对贸易的垄断，另一面则是想通过幕府对海外贸易行使直辖权的方式来抑制西国大名的势力。同时，德川家康还试图通过各国对其地位的承认，而对国内诸大名产生威慑。为了说明这一事实，以下列表说明从庆长十三年到庆长十八年之间幕府与吕宋、荷兰及英国等外国国王的书信往来。

① 永积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覽』、创文社、1987 年。

② 『通航一覽』第五、国书刊行会、1913 年 5 月 25 日。

年 月	国 别	对幕府将军的称呼方式
庆长十三年五月	吕 宋	征夷将军（德川秀忠）
庆长十五年十一月	荷 兰	日本御主大御所殿下（德川家康）
庆长十七年六月	西域国（葡领）印度	日本国主 源德川家康贵君
庆长十八年八月		大日本国王陛下 日本将军样
		幕府在回信时的自称
庆长十三年八月	吕 宋	日本国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
庆长十四年七月	吕 宋	日本国 源德川家康
庆长十七年十月	荷 兰	日本国 源德川家康
庆长十八年八月	英 国	日本国 源德川家康
		幕府在回信时对对方的称呼
庆长十三年八月	吕 宋	吕宋国太守 足下
庆长十四年七月	吕 宋	吕宋国主 麾下
庆长十四年七月	荷 兰	阿兰陀国主 殿下
庆长十八年八月	英 国	英国国主 麾下

资料来源：《异国日记》、《外蕃通书》、《通航一览》。

如上表所述，荷兰等国对德川家康称之为“日本国主、大日本国王陛下”。然而德川家康却始终自称为“日本国一源德川家康”。可是对于荷兰等国的国王，德川家康却一直称之为“○○国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外交和内政的两重意义。在外交上，德川家康将“国主”视为一国的最高权力者，他也接受外国的君主这样称呼他。然而他却从不自称“国主”。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川家康认为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非是对等的。如同在《遣大明国》里所述的那样：“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宝。”与上述国家的交往，在日本看来是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型体制”。对内而言，大御所德川家康因为被外国国君称为“日本国主”、“大日本国王陛下”，与诸路大名的地位有根本的不同。这也是庆长年间后期幕府之所以要积极推进与外国交往的根本原因。

（三）自称为“日本国主”的德川家康

在《遣大明国》一文里，德川家康没有被写为“日本国一源德川家康”而是写为“日本国主”。这样的写法在现存庆长年间众多幕府外交文书中是一个例外。另外，文书最后部分还写道：“我邦虽海隅日出抑谚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在此，明朝被称为

“中华”并被冠之以“大”，而谦称日本为“小”。幕府所采取的这种外交低姿势也只能被认为是出自于德川家康的指示。

至17世纪为止，中国大陆历代王朝与周围诸国的关系大多数建立在“朝贡”及“册封”基础之上，也就是所谓“华夷秩序”。而日本从古代起就对中国抱有一种对等意识，除了室町时代的部分时期以外，基本上没有加入过“华夷秩序”。罗纳德·多比教授对其原因进行了如下分析：“自古以来，日本就存在将天皇神格化，并将之与神话进行紧密联系的自我认识。所以很难设想让日本承认有比它处于更为上位的权威的存在。”^①

多比教授认为日本从古代中国开始就未曾参与“华夷秩序”的原因是被神格化的天皇的存在。然而在江幕府初期却出现了例外，德川家康积极参与制定了对明外交策略。《遣大明国》及《遣福建道陈子贞》的起草及其为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正是其具体表现。虽然这两封文书都未能被传递到明朝当局手中，明日关系也未能像德川家康所期待的那样得到发展。但是，从今天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封文书，特别是《遣大明国》充分反映了当时幕府对明朝外交的姿态。可以认为，江户初期，德川家康为了恢复与明朝的外交关系，甚至曾考虑过将日本归置于明朝的“朝贡体制”之内。

（四）江户初期幕府的对外关系

江户初期，幕府对外关系由以下三部分构成：（1）依托于民间贸易的对明朝关系；（2）以耶稣会为媒介的与东南亚诸国及西洋诸国的关系；（3）以对马藩的宗氏为中介的日朝关系。

关于第一点，如前所述，明日两国之间虽然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在两国政府的默许下，由民间贸易所带动的各种交流活动一直没有终止过。关于第二点，幕府对于耶稣会和基督教信徒在不同的时期曾经采用了完全相异的政策。而幕府的宗教政策对当时的明日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上帝”与“神、佛”

关于江户初期幕府与基督教的关系，永积洋子教授指出：“德川家

① トビ、ロナルド『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史』、创文社、1990年。

康时代，外国人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能前往将军府拜访将军。而威廉·阿达姆、扬·约斯丁作为德川家康的亲信与幕府的关系很亲近。可见，对于外国人，幕府政权的戒备心很少。”^①

实上，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之前，还曾经接见过基督教弗朗西斯克教会的宣教士杰罗尼莫，要求其帮助日本与西班牙进行谈判，具体地说，是要求其协助日本与太平洋对岸的墨西哥进行贸易活动。此外，德川家康为了缓和因“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②而与日本交恶的基督教国家的外交关系，曾经在一段时期内默认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布教活动。有关这一点，从《哲利斯日本渡航记》中可以得到证实。此书是这样记述的：“在这个被称为首都的城市里，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徒建造了非常漂亮的学舍，那里面有众多日本人的耶稣会徒，他们用日语印刷的新约圣书接受传道。在这个学舍里又有为数众多的日本儿童，他们被教之以罗马教会式的基督教宗旨的基本知识并接受了训练。在这个被称为首都的城市里，信奉基督教的日本人的数不下于五六千人。”^③

庆长五年（1600）德川家康取得了关原之战的胜利，并于同八年成为了征夷大将军。然而，根据藤野保教授的研究，关原之战结束后，朝廷、寺社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强大，丰臣一族势力依然如旧，这一切都使德川家康无法安心。因此，对内，他将各路大名进行改易、转封、扩大天领地（直辖地）、任命谱代大名等；对外，则一改丰臣秀吉时代对外的强硬政策而进行灵活的应酬。如果说在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只允许存在“神、佛”，而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则是“神、佛”与西洋的“上帝”共存的。

过了不久，这个西洋的“上帝”就随着幕府政权地位的稳固而再次受到了迫害。以元和九年十月幕府将几名基督教信者在江户芝处以极刑为契机，此后又有为数众多的基督教信者被处以死刑，幕府对基督教的管制逐渐变得严厉起来。

（责任编辑：张义素）

① 永积洋子『近世初期の外交』、创文社、1990年3月15日。

② 庆长元年十二月（1596年），丰臣秀吉将弗朗西斯克6名会员和20名日本人处死于长崎西坂的事件。

③ 村川坚固訳『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雄松堂书店、1970年2月。